

清初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改革

——来自闽南的例证

刘永华

郑 榕

(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363000)

内容提要:粮户归宗是清初在中国东南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赋役制度改革,对清代福建、广东等省的赋役制度和社会结构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。本文通过仔细解读近年在闽南发现的族谱、碑刻、笔记与地方志资料,侧重考证了这一改革在闽西南地区推行的背景、缘起、过程与影响,从而加深我们对这一改革的了解。

关键词:粮户归宗 里甲制度 军户 福建

粮户归宗是清初中国东南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里甲赋役改革,其基本内容是“按宗族系统归并钱粮花户、征派里甲赋役”。这一改革曾先后在清初的福建、广东等省实行,对当地的里甲赋役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过重要影响,应该说是清代里甲赋役制度史和社会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,近年来一些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曾涉猎这一问题。刘志伟在讨论清代广东图甲制时指出,康熙朝晚期,广东地方官曾实行粮户归宗制度,令“有粮少不能自立户,附于别户之后”的畸零户实行“归宗”,“或归同姓之户,或数姓合立户籍”。陈支平在讨论清初福建的“大当之移”时,也曾提及闽浙总督兴永朝在福建实行的“任甲户择户归合”的“归宗合户”之法。最早并最为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的当数郑振满。他在讨论明清福建沿海地区的宗族发展时,曾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讨论。他认为粮户归宗在福建实行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年(1691)前后,并引述方志、谱牒、碑刻和笔记等多种资料,讨论这一改革与宗族发展的关系。

对于这个今天看来如此重要的里甲赋役制度改革,方志的记载却常常语焉不详,对兴永朝本人的记载只有寥寥数字,兴永朝本人的传记,对粮户归宗甚至只字未提。由于资料的局限,围绕这个改革的不少问题,从这个改革的缘起,到兴永朝在改革中扮演的角色,再到这一改革在地方上的具体实施情形,目前学术界都尚未进行正面的、翔实的考辨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讨论这一改革:首先,追溯福建里甲制自明中叶以来发生的变化;其次,考订兴永朝的生平,他在闽浙总督任上的事迹,及粮户归宗改革的缘起;再次,以陈汝咸在漳浦县境内推行的里甲赋役改革为例,讨论粮户归宗改革在地方上推行的过程;最后,透过对漳州原铜山千户所军籍归宗合户的个案研究,考察粮户归宗改革在地方社会的实施情形及其影响。

一、明清福建里甲制的变质

粮户归宗是对里甲赋役制度的一项改革,要讨论这一改革,首先必须回顾明初开始实行的里甲赋役制度及其变质。

明太祖在洪武十四年(1381)在全国推行黄册里甲制,其制“以一百一十户为里,一里之中,推丁粮

郑振满:《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,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,第190页。

刘志伟: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——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,第266页。

陈支平:“清初福建‘大当’之役考略”,陈支平:《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》,黄山书社2004年版,第211页。

郑振满:《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,第190—194页。

多者十人为之长,余百户为十甲,甲凡十人。岁役里长一人,甲首十人,管摄一里之事。城中曰坊,近城曰厢,乡都曰里。凡十年一周,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。每里编为一册,册之首总为一图。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,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,而列于图后,名曰畸零”。里甲制度的主要职能是征收赋役,同时还被赋予多种行政、司法、教化等社会职能。田赋征收的最重要依据不是地籍,而是里甲户,里甲户“不仅是纳税的主体,也是王朝征课赋税的对象”。本来,里甲制度是建立在实在人口之上的,而里甲户似乎对应于实在的家庭。不过,大致从明代中叶开始,由于里甲户与实在人口分离,里长户与甲首户地位的分化等原因,里甲制度出现了诸多变化。

明中叶里甲制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,是里甲户与实在人口的分离,这一变化与里甲的徭役负担密切相关。本来,里甲的基本职能是催征钱粮,勾摄公事,后来扩大至支应官府诸费甚至私费,加上胥吏勒索,里甲动至破产。结果,民间往往花分子户以避重役,甚至千方百计隐瞒户口,使官方对里甲户籍失去控制,户籍编审失去实际意义。因此,至迟在成化(1465—1487)、弘治(1488—1505)年间,福建“各地相继对里甲户籍实行定额管理,其有关赋役也由里长及甲首阶层实行定额承包”,导致“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负担的定额化”。在这种情形下,里甲户仅仅是缴纳公粮的单位,与实际的家庭没有关系,在一个里甲户之下,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家族,几十户至几千户的家庭。这是粮户归宗实施的制度前提。

明中叶里甲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,是里甲户和甲首户地位的分化。在明初里甲制的制度设计中,里长户与甲首户之间的确存在某种阶级的区分,因为里长户原则上是由一里之中丁粮较多的家庭担任的,不过,他们在法律的身份上并无差别。然而,随着里甲户籍的世袭化,出现了一姓一族霸占一里、奴视甲首户的情况。据康熙《漳浦县志》记载:“[漳州]甲首俱称为里长,其余皆称子户,亦称甲首。里长之于子户,不啻主仆之分,因并诸户而统为一户,遇编审之年,所谓亲供者,皆里长一人所自造。其子户皆非一处,甚至隔府越县,祖宗为其子户,子孙世受管辖,如欲改归别图,即谓之跳甲、越甲,禁例甚严。漳俗无里长户者,即目之谓小家。其有势力之人,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,谓之顶班。无势者虽田连千顷,不得受人节制,至单寒小姓,更无论矣。”这种情形并不限于漳州,但以漳州最为严重。事实上,光绪《漳州府志》所引康熙府志的《合户始末》一文,即是讲粮户归宗改革的原因,归咎于里长户欺压甲首户的弊端:

……法久弊生,县中应里长者,皆丁多粮多之户,素已欺凌弱户。时当催征,县官又不行拣选,听里户自行推举,应役者皆系狡猾,以催征为生涯。里户在乡,止以丁粮付完,有终年不到县门者。每里长到家,必厌酒肉,佃仆之呼,鞭箠之使,差役任其飞洒,丁口听其增减,指一派十,无所不至,是以漳俗有“十日割茅,不及里长一日骗”之谣。里户老少,皆称里长,目甲首为子户,为图民。甲户虽班自(斑白)垂老,见孩童里户,必称为叔行,甚至甲户没故,其遗下子女,里户径为主婚买卖。……间有一二甲首欲求出户,有司视为奇货,苛求恣取,胥吏复因而需索之,自县而府而司,其费不貲,而猾里复以变乱版籍为辞,告究经年,殴辱备至,幸而出户,其家已倾,不幸而仍在户下,仇怨愈甚,是以甲户皆吞声隐忍,世受科制,闽俗皆然,而吾漳为甚。

因此,毫不奇怪,粮户归宗改革的提议,首先是由漳州的乡绅提出来的,这一改革推行的地区,最初也只限于在漳州,后来才在福建全省推行。
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35,洪武十四年正月,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,第2143—2144页。

刘志伟: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》,第53—57、71—92页,引文见第76页。

郑振满: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,第246页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20《续志》。民国十七年漳浦同文美记印书局翻印本,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68年影印,第1590—1591页(原书无页码,页码为成文影印本所加)。

光绪三年刊《漳州府志》卷14《赋役上》,“合户始末”条,第20页上—20页下。

二、兴永朝与粮户归宗改革的推行

光绪《漳州府志》所引《合户始末》一文,对粮户归宗改革推行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。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详,不过,可以看出,作者显然是粮户归宗改革的支持者或同情者。文章首先追溯了里甲制的起源和明初里甲制的基本内容,进而作为清初粮户归宗改革的铺垫,谈到里甲制度的变质和弊端(已见上引),接着便谈到康熙二十六年(1687)粮户归宗改革的地方缘起:

康熙二十六年,适闽浙总督王鹭有里甲编^祐(疑有误)之檄通行各县。时海澄乡绅郑之惠倡首,将里甲积习,痛陈之县官胡鼎,通详院、司,愈允檄行到县,准各甲顶补,归宗合户听民便。一时澄邑甲首,相视顶补归宗者,计有四百余户。而里役恶其害己,醵党鼓噪(噪)县庭,碎公座,焚碑榜,舁抬龙亭,入郡呼控。复有余党赴诉于总督处,藉卖里卖甲为由,词连县尹,而首及之惠。之惠乃率甲首六十余户至会城,经运司一鞠,会府再鞠,藩司、臬司会鞠两次,四阅月始定。以其事上之新总督兴永朝,乃通行全省。册内各去里甲名色,听均甲、立户自便。

由此可知,粮户归宗改革虽于康熙三十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,原其始则在康熙二十六年,发其端者为海澄乡绅郑之惠。郑之惠乃是顺治十四年(1657)举人,曾任邱县知县。他虽属士流,但应为甲首户,曾受过里长户的欺凌,因而利用重新编审的机会,一举发难。此事先告到海澄县知县处,后得到省政府的批准。但“里役”因利益受到损害,将知县一同告到闽浙总督王鹭处,复经运司、府、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等各级官府长达4个多月的4次会审,取得了统一意见后,上报给康熙二十八年刚升任闽浙总督的兴永朝,得到兴的批准后,最后粮户归宗改革才在全省范围内推行。可见粮户归宗改革最终虽由兴永朝在福建全省推行,其实在他的前任王鹭担任闽浙总督期间,已经同意并一度推行这一制度,只是当时改革推行的地区似乎只限于漳州府。

兴永朝是何许人也?按,兴永朝(1632—1701),汉军镶黄旗人,初由笔帖式授礼部主事。康熙十三年(1674)“三藩之乱”时,得到刑部尚书莫洛的赏识,随同莫洛经略陕西,嗣因莫洛荐举,补授关南守道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,擢偏沅巡抚(后来的湖南巡抚)。次年五月,迁闽浙总督。康熙三十一年(1692),调任漕运总督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二月,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,旋因病罢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署副都统从征葛尔丹。次年,授镶白旗汉军副都统,康熙四十年(1701)以病乞休,允之。兴永朝担任闽浙总督的时间,在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(1689—1692)之间,历时3年有余,时间较偏沅巡抚长,但兴永朝传中,只字未提他在闽浙总督任上的政绩,更不必说粮户归宗改革一事,可见时人似不以此事有可足称道之处。不过,从他在湖南推行的改革看,粮户归宗改革所依据的精神,大体还是均徭役的路线。

兴永朝虽由吏部出身,其才干还在理财。在偏沅巡抚任上,曾上疏以湖南征地丁银不及原额十分之六,认为原因在于“自明季兵火,荒[田]、熟[田]混淆,豪黠者隐田漏课,愚懦者业失粮悬,以致讼日繁,包赔滋累”,主张进行丈量,“惟见田量田,不遗尺寸,熟者定为实征,荒者渐俟招垦。粮随田办,丁照粮编。更以弓口田形造鱼鳞细册,存之公府,藉为左券”。疏入,敕部议行。康熙二十八年离任

光绪三年刊《漳州府志》卷14《赋役上》,“合户始末”条,第20页下。

乾隆二十七年刊《海澄县志》卷9《人物志 选举》,第15页上。

这里的“院、司”指的当是总督、巡抚两院与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等省级行政机构,参见 Charles O. Hucker, *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*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5, pp. 88—89.

王鹭(1613—1695),山东福山人,顺治十二年(1655)进士,官至户部尚书,康熙二十七年(1688)三月至次年五月担任闽浙总督,为时一年零两个月。参见朱方增:《从政观法录》卷7,第12页上—14页下,“户部尚书王鹭”;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肆辑第拾柒册据清道光刻本影印。

朱方增:《从政观法录》卷10,第6页上—8页上,“漕运总督兴永朝”;李桓: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卷161《疆臣十三》,第23页上—25页上,“兴永朝”,光绪十至十六年刻本。

后,他又上疏言湖南“未竟”之事三,其一即清丈荒熟地亩事。兴永朝提到的“粮随田办,丁照粮编”的措施,所依据的是明中叶以来“均田均役法”的精神,在康熙朝主张“丁随粮办”的官员中,应属较早的事例。不过,兴永朝在湖南实行的清丈政策,并不很成功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六月,康熙在上谕中指出:“……闻湖南百姓甚苦,皆由兴永朝、王梁、杨凤起三人相继扰害所致。”这里虽未明言清丈扰民之弊,但兴永朝任巡抚一年期间,实行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清丈,康熙所说的“扰害”,应该便是此事。正因为如此,康熙在兴永朝乞休之时,才会有“兴永朝前任督抚,并无裨益兵民之事”这一考语,对兴永朝的政绩颇不以为然。

兴永朝在福建全省推行粮户归宗改革的时间,一般认为是康熙三十年,但从《合户始末》看,兴永朝接任闽浙总督之初,便批准了这项改革。按,兴永朝接任闽浙总督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,他大约在此年下半年或次年批准了这项改革,但当时编审限期未到,因此,很可能到康熙三十年进行新一轮的编审之时,这一改革才真正得到推行,这也就是为何志书记作康熙三十年的原因。兴永朝推行的粮户归宗改革的主要内容,《合户始末》的记载是“册内各去里甲名色,听均甲、立户自便”。所谓“各去里甲名色”,指的应是废除了里长户和甲首户的区分;所谓“均甲”,应是均匀里甲的徭役负担;所谓“立户”,即是准许设置花户,直接向政府交纳赋税,也就是前引乾隆《龙溪县志》所称“归宗合户之法”或“任甲首择户归合”的做法。这是改革最为重要的一项条款,归宗合户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款,因此,在不少地方文献的记载中,仅提及归宗合户一项,他如废除里甲名色和均甲则未置一词。

三、漳浦知县陈汝咸的里甲赋役制度改革

兴永朝调离闽浙后,福建的一些最高行政长官继续推行粮户归宗改革,但成效不一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闽浙总督郭世隆“颁示编审条规,有清册籍,查欺隐,立的户,革甲首,严收除,禁滥免,择里书,均粮额,禁禁苗买卖,禁需索十款”,这里的“立的户”、“革甲首”等款,应与粮户归宗改革的内容大同小异,但据说因“积习相沿已久,各县俱不能行”,可见粮户归宗改革在实施过程中曾遇到不小的阻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地方官的决心和能力,可能成为决定这一改革能否贯彻推行的重要因素,陈汝咸在漳浦县推行的里甲赋役改革,属于比较坚决推行改革精神的一个例子。

陈汝咸(1658—1714),字莘学,号心斋,别字悔庐,浙江宁波府鄞县人。康熙三十年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康熙三十五年,出知漳浦县。康熙四十七年(1708),调任南靖县知县。次年,内擢进京,先后担任刑部主事、监察御史、通政司参议、鸿胪寺卿、大理寺少卿等职。康熙五十三年(1714),卒于

朱方增:《从政观法录》卷10,第6页下—7页上。

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93,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戊戌条,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,第13页上—下。

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0,康熙四十年正月甲寅条,第3页上。

郑振满: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,第190页。康熙《漳浦县志》卷20作康熙二十九年,见下文。乾隆《龙溪县志》卷5《赋役》的记载没有明说具体时间,但可知迟于康熙十九年(1580)姚启圣革除大当、小甲之役,参见下文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20,第1589—1590页:“本朝因仍明制,五年编审,十年大造。盖因丁口消长不时,未可迟至十年。故五年审丁一次,至十年则并丁田而审之。”

乾隆二十七年(1762)《龙溪县志》卷5《赋役》,第10页上:“国初有大当、小甲之役,……康熙十九年(1680)总督姚启圣奏请革除,使民自征,并禁里长包粮之弊。后总督兴永朝复行归宗合户之法,革里班名色,任甲首择户归合。”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20,第1593—1594页。郭世隆(1645—1716),字昌伯,号逸斋,汉军厢红旗人,以父军功袭职,官至刑部尚书,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(1695—1702)担任闽浙总督。参见钱仪吉《碑传集》卷19《郭世隆传》,中华书局1993年版,第630—642页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20,第1591页。光绪《漳浦县志》康熙二十九年作康熙三十九年,疑误。参见光绪续修《漳浦县志》卷20《续志》,第6页下—7页上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,影印民国二十五年朱熙印本。

钱仪吉:《碑传集》,收入陈汝咸碑传三种,蔡世远:《大理寺少卿陈公汝咸墓志铭》;全祖望:《大理悔庐陈公神道碑铭》;蓝鼎元:《月湖先生传》。参见钱仪吉《碑传集》卷41《内阁九卿中》,第1136—1149页。

官。陈汝咸自康熙三十五年出知漳浦县,康熙四十七年才调任他职,在漳浦担任了 13 年的知县。在任期间多有建树,后来漳浦父老“乃袁公在县时告约、谕条、文移,辑为《漳浦政略》一书梓之”。此书恐不传于世,不过,陈汝咸编纂的《漳浦县志》收入不少他撰写的告约、谕条、文移之类,让后人了解他在漳浦推行的改革提供了可能。

陈汝咸出知漳浦县前,当地已实行粮户归宗制度,志称:康熙二十九年,“为闽中有里霸之弊事,奏文令民得归完合户”,“于是,凡为子户者,各寻同姓里长附合,可无里长、子户之分,而无宗可归者,尚不乏人,无法自脱”,说明粮户归宗确曾在当地实行,但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。他到任后发现,“浦邑通县五十二图,计五百二十甲,止五百二十户。凡完粮者,不知为何图、何甲,而止知为某人户内”。这种情形对官对民都不利。一方面,各户户长“并无定人,大约武断乡曲之人来充是役,谓之里班”,他们“本身无半亩之产,因有祖户老名,尽将他人之田,收入己户,或数百亩,或数十亩,钱粮必归伊代纳”,“每丁必多收一二钱,每亩必多收四五分,皆相习为固然,从无花户册可问,亦从无业户自完之例”。这种情形表明,在陈汝咸出知漳浦县之前,粮户归宗改革在漳浦推行的效果并不理想。另一方面,这种“审丁则多寡莫测,而编图则盈缩不一,户长之收粮可以高下任意,业户之完串更属影射难凭”的情形,不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赋役征收,而且容易引起民事纷争,无形之中增加地方政府的行政负担。

为解决上述问题,陈汝咸在漳浦推行了均粮额、均保甲等项改革措施。根据蓝鼎元的概括,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:

[公]念编审为赋役大政,非精详整顿,不能使宿弊一清。日夜焦心劳思,躬自核算,编粮均户,人丁各归现在之籍,令民自具亲供,实计丁口产业,自立征户,自封投纳,除户长承管之弊,岁省民二千余金。均保甲,清屯粮,并寺产,除根租,行滚单之法,使粮户自相催纳,不用图差。

陈汝咸改革的基本思路是,为减轻百姓的负担,通过均粮额和均保甲,设置征粮册和保甲册,让百姓绕过户长和书吏的盘剥,直接为政府提供赋役。具体做法是:一、以保甲取代里甲,依照地缘的原则,建立保甲制,编成保甲册;二、编纂征粮册,通过保甲系统将供单发给百姓,由百姓自行填写丁粮事产,再经甲长、保长缴县,从而直接控制各乡村丁粮的数目;三、废除里班老名,且使之各归本都,凡“有田者皆可完粮,有粮者皆可立户”。通过这些措施,陈汝咸试图重建地方政府对乡村的控制。陈汝咸出任漳浦县知县时,当地的编审工作已经结束。至康熙四十年(1701)再行编审时,他的改革才最终得到推行,距兴永朝推行粮户归宗改革已达 10 年之久。推行之初,也遇到不同方面的阻力,不过,“三年而法立”,经过 3 年时间的努力,改革似乎终于得到贯彻执行。

应该说,陈汝咸改革的基本内容,虽与兴永朝的粮户归宗改革有异,因为前者是对乡村控制体系的整体重建,而后者只是允许粮户自行立户和归宗合户,现存陈汝咸留下的文章,也没有提及兴永朝的改革,不过,陈汝咸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,遵循的大体还是兴永朝的思路,同时,他采取的废除里班老名的措施,无疑为归宗合户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。因此,一些民间文献在讨论归宗合户时,将之与陈汝咸的改革联系在一起,下文讨论的铜山《南屿陈氏族谱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

按,陈汝咸卒年,全祖望作康熙五十五年,其余文献均作康熙五十三年,今从江庆柏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,题作康熙五十三年。参见江庆柏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447 页。

钱仪吉:《碑传集》卷 41,第 1142 页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 20,第 1591 页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 20,第 1591—1592、1600、1614 页。

钱仪吉:《碑传集》卷 41,第 1145 页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 20,第 1609 页。

钱仪吉:《碑传集》卷 41,第 1145 页。

四、粮户归宗与清初铜山军户的户籍问题

要了解铜山陈氏宗族与粮户归宗的关系,必须从明初当地的卫所军户制度开始谈起。铜山即今东山县铜陵镇。明代以前,这里只是渔民寄居之地。洪武二年(1369),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建立卫所,在铜山设所,隶属镇海卫。起初,明政府调漳州军戍守,但因“军家于漳,多不在伍”,因此,洪武二十六年(1393)“去漳军,而以兴化军易之”。陈氏宗族的祖先陈苟便属于从兴化调来戍守的士兵之一。此后又陆续有汀州兵、戚继光的义乌兵来此驻守。在整个明代,铜山城可以说基本上是个以军籍为主体的社区。清初实行的迁界政策,对铜山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,铜山居民被迫内迁云霄等地,康熙十四年(1675)复界之后,才陆续迁回铜山。同时,由于清政府废除了卫所制度,这些明代军籍的后裔被纳入里甲户籍系统,成为必须纳粮服役的民户,陈氏宗族就是在这样一个户籍身份转换的过程中,经历粮户归宗改革带来的变革。

根据《南屿陈氏族谱》的记载,陈氏祖先陈苟于洪武二十七年(1394)由平海卫莆禧所(在今莆田境内)移戍铜山。有明一代,陈氏族人属军籍,谱载:“吾族与通铜诸姓,……俱是军籍,所有田地,系就别户输纳钱粮,从无纳丁”,当地碑刻亦称:“官与军咸袭封,是为军籍。里甲丁粮,世莫之闻。”康熙三年,清廷实行迁界,陈姓和其他军户被迫内迁,“族人分散各处,不可胜纪”。康熙十四年,“始复界,族人复鸠集铜山,止略过半”,接着就在铜山重建宗祠,安设神主,恢复祭祖仪式。在重建宗族的同时,他们也重新建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。康熙六年(1667),卫所归并州县,康熙十七年(1678),又将军户编审,谓之屯丁,原铜山军户划归漳浦县管辖。

陈氏族人和原铜山军籍迁回铜山后,卫所制度已被取消,又尚未登入黄册,大概做了 20 余年的“无籍之民”。因此当地碑记称“故莘庵陈公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,而铜至此有丁粮之事焉”。这位陈公即上文论及的陈汝咸。关于这段史事,《南屿陈氏族谱》收录康熙时族人、乡饮宾陈光国所撰的《丁粮沿革杂记》一文,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记载:

本朝康熙四十年,漳浦县主陈公汝咸编甲均亩,铜山各户编作六都一图一甲、二甲。一甲诸姓附入云霄李隆户内;二甲诸姓附入龚谟烈户内。本族即系二甲,内陈姓共配八官丁,即以本族陈得光之名为八官丁户头名。至四十五年,陈老爷编审,再添一丁,共九官丁。

我们知道,陈汝咸推行里甲赋役制度改革的时间正是康熙四十年,但此时包括陈氏族人在内的原铜山军户尚未合户,而是分别在漳浦县属云霄的李隆、龚谟烈两户内输纳丁粮,因此碑记认为这是“泛而无宗,傍人门户”。

至康熙五十年(1711)再次大造之年,原铜山军籍才行合户之举。究其缘起,则“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,共尊关圣帝君为祖,请置户名曰:关世贤,纳粮输丁,大称其便”,也就是说,他们听说诏安原军籍共尊关帝为祖,立户名关世贤输纳丁粮,^⑩因此萌发了合户的念头。于是,康熙五十年编审时,他们也共尊关帝为祖,立户交纳赋役:

五十年编审,铜山各姓虑恐附人门户,将来有所不便。俗云:作户丁是也。于是就关帝庙公

参见《南屿陈氏族谱》不分卷,《丁粮沿革杂记》,1985 年油印本,第 13 页下。

乾隆二十五年《铜山志》不分卷,《铜山所志旧序》,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。

《南屿陈氏族谱》,《丁粮沿革杂记》,第 13 页下。

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,康熙五十二年立,现存于东山县铜陵镇关帝庙内。

《南屿陈氏族谱》,《建置沿革修理志》,第 8 页下—9 页下。

康熙三十九年《漳浦县志》卷 20,第 1617 页。

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。

《南屿陈氏族谱》,《丁粮沿革杂记》,第 13 页下。

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。

^⑩ 这里提到的诏安军籍,指的应是原镇海卫所辖悬钟千户所的军籍。

议,一、二甲合作一甲,以关为姓,永茂为名,作通铜之总户名。另照姓分柱,使丁苗不得混襟。时光国、林建爹、黄泰公为诸姓公金到县料理,承买十七都六图九甲蔡子听户名,以为铜山盛户,费金百余两,近二年而事方归局。

可以看出,原铜山军籍自康熙四十年编入黄册,10年后方始归宗合户,上距兴永朝推行粮户归宗改革已达20年之久。

由于军户姓氏驳杂,最初所谓“归宗”,其实只是共尊关帝为祖,户名以关为姓而已。但由于后来事态的发展,关永茂户内各姓才进行调整,组合成为一个宗族。大约在康熙五十三年,他们偶查县府司户册,发现“有一户关永茂,即黄启太等,其间大有移花接木、藏头露尾之虞”,他们认为“夫事方三载,即如此互异,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桀黠辈从中滋蔽,蚕我子孙乎”?于是,“公诸同人,当神拈阄,分为七房。小事则归房料理,大事则会众均匀。叔伯甥舅,彼此手足,并无里甲之别,终绝大小之分。不得以贵欺贱,不得以强凌弱。苟有异视萌恶,许共鸣鼓而攻”。通过这一方式,迁回铜山的原军户后裔不仅合立一户,而且组合为一个由多姓组成的拟制宗族组织。这也许是兴永朝推行粮户归宗改革之初不曾预想到的社会后果之一。

应该说,宗族与户籍的结合,并不始于粮户归宗改革。一族占据一户的情形,从明代中叶即已开始。明中叶起宗族组织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普及,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现象。粮户归宗改革在社会经济史中的重要性,在于它为这种民间的做法提供了制度的依据,从而强化了明中叶开始的宗族与户籍结合的趋势。

清初推行的粮户归宗改革,至清代后期已罕为地方官知晓,他们对这一改革带来的影响深感不解。道光年间担任诏安县知县的湖南人陈盛韶,发现一族合立一户的情况在当地相当普遍:“国家维正之供,全重鱼鳞实征册一书。诏邑不然,官陂廖氏,附城沈氏,及为许、为陈、为林,田不知其几千亩也,丁不知其几万户也,族传止一二总户名入官,如廖文兴、廖日新、许力发、许式甫是也。更有因隐避役徭,数姓合立一户,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;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。”这里提到的廖、沈、许、陈、林等宗族,均合立一总户,而数姓合立的关世贤户,正是上文提及的诏安军籍所立总户。陈盛韶对这一做法的由来大惑不解,不过,他也认为,在这种制度下,“田丁俱无而粮空悬,合族匀赔,不起争端,彼此买卖,私相过割”,国课的征收很有保障,也算是个差强人意的制度。其实,兴永朝在推行粮户归宗改革之时,考虑的也应不只是均摊赋役负担的问题,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户籍与宗族的关系,借助宗族的自我管理机制,从而更好地保障丁粮的征收,达成对乡村社会长治久安的统治。

《南屿陈氏族谱》,《丁粮沿革杂记》,第13页下。

《公立关永茂碑记》。

对这一过程的讨论,也请参见郑振满《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,第193—194页;陈支平主编:《福建宗教史》,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,第480—482页。

陈盛韶:《问俗录》卷4《诏安县》,“花户册”,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93页。